

日军在北京也有一支“731” 起底侵华日军1855细菌部队

一份1950年的报纸

1855部队又被称为“华北731”。记者经过大量史料调查发现,原1855部队队员松井宽治在1950年1月10日刊发在日本《赤旗》报上的证言是重要的一手参考史料。经过多方努力,记者在日本找到了这份报纸。

“我应召入伍,在满洲接受了3个月的步兵训练后,于昭和20年(注:即1945年)被调到北京,派入1855部队筱田队(注:第三课课长筱田统)做卫生二等兵。这里是细菌武器研究所,主要培养鼠疫菌和跳蚤,准备对苏作战。”

“北支那派遣军1855部队,由当时的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官下村定指挥。部队长是前军医大佐西村英二,本部设在北京的名胜——天坛的近旁,表面上做的是野战供水和传染病预防。工作部门设有第一课(病理实验)、第二课(制造菌苗)、第三课(细菌武器研究所)。”

松井开头简短的证言,让记者深感震撼。再翻开《留守名簿》查找核实,在超过1200人的名单中,“西村英二”“筱田统”“松井宽治”的名字都一一在册。

这么一支庞大的细菌部队,居然就隐藏在北京的皇家祭天场所。记者联系到北京市档案学会副秘书长张斌进一步深入采访。

三口消毒锅6支试管

从天坛公园西门进入,张斌边走,边向记者介绍,1940年2月,经日本天皇敕令,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正式成立,代号甲第1855部队。该部队在北京有一个本部和下属三课:第一课在协和医院,本部及第二课在天坛神乐署及其周边,第三课则在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对面的静生生物调查所。

走进神乐署,张斌从包里拿出曾被记录在《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业务详报》的旧地图,边对比,边讲道:“神乐署正中央的凝禧殿、显佑殿是本部的库房。北侧,在民国时期是生产血清、疫苗的中央防疫处生物制品所,被日本人占领后就直接被用于制造菌苗,他们在这里挖了地下冷库,专门用于储存菌苗。”

张斌介绍,日本投降后,中央防疫处的工作人员来此接收,在天坛院内发现了三口分别重达11吨、12吨和13吨的超大消毒锅。1950年,工作人员又从封存了4年多的地下冷库发现了6支以女人名字命名的试管。“后经专家对试管内残留的菌种进行培养,发现其中的5管仍具有强毒性,均为鼠疫杆菌。”张斌说。

走进神乐署三进院落的最深处,天坛公园工作人员党宏斌向记者展示了两张1855部队相关的照片。照片上,一名日本军人拿着试管在院内观察,另一名日本军人在院内老槐树下留影。“这棵600余年的神乐槐,静静地见证了这里发生的一切。”党宏斌说。

两份民国档案

松井在其证言中还说道:“我听尾崎技师说,1942年,有一次曾通宵生产大量跳蚤,运到外面去。同时,据说曾

近日,日本细菌战研究专家、滋贺医科大学名誉教授西山胜夫向新华社记者展示了一份他新发现的《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甲第一八五五部队 留守名簿》的文档扫描件。

这一留守名簿编写于二战期间的1945年2月28日,与此前发现的战后1945年8月29日编写的该部队留守名簿不同。“新发现的这份留守名簿清楚地展示了其管理业务规则,该部队部分班组的名称及其负责人的名字也被清晰列出,非常难得。”西山说。其中显示,该部队本部位于北京,下属有石门(石家庄)、济南等5个支部,天津、塘沽、青岛等7个派出机构,以及确山、壤城两个分遣班。

日军在北京也有像731一样的细菌部队?这到底是怎样的一支部队?是怎么实施细菌战的?给华北一带的民众造成了哪些伤害?记者由此展开了一场跨国寻找侵华日军罪证的追踪。



如今的天坛神乐署后殿及回廊,院内的神乐槐至今仍在。 据北京日报

□相关链接

1855部队曾在济南等地进行活人实验

与惨无人道的731部队一样,1855部队也用活生生的中国人做实验。1855部队把“当作动物实验”的活人称作“猿”。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谢忠厚研究发现,与731部队相比,他们在获取实验对象的方式上,更随意、更猖狂;在实施人体实验的部队和人员上,更无序、更宽泛;在进行人体实验的地点上,更分散、更广泛。

韩国人崔亨振曾在1855部队济南支部做过日文翻译,目睹了日军种种惨无人道的暴行。1989年7月21日,他在韩国《中央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日军在中国的第二支细菌部队》的报道,揭露该部队的恶行。

崔亨振写道:“军医们把鼠疫等各种病菌注射到中国俘虏身上,然后观察整个发展过程。被注射过鼠疫菌的俘虏,其中有十几个人经过一场恶寒和高烧的痛苦后死去……”

“实验对象不足时,军医们就到附近村庄随便抓来中国大人和小孩进行实验。军医们还对离部队8公里远的一个村子50多户300多名村民进行霍乱的人体实验。他们先把染有霍乱菌的猪肉等狗食撒在村里,经过15天左右因霍乱死了20多人后,就宣布这个村子为传染病发生地区,然后便观察防疫和治疗过程。”

这支部队平均每3个月进行一次人体实验,每次要死100多名俘虏。因此,一年要杀死400到500多名俘虏。崔亨振说,他在这个部队服役期间,死亡的俘虏有1000人。

“这些事实证明,1855部队的人体细菌实验与解剖观察,是有计划、经常进行的,其数量也是相当惊人的。”谢忠厚说。



天坛公园神乐署内的侵华日军细菌部队遗址。 据北京日报

更令人发指的是,1855部队还用活人制造大量细菌战剂。

战俘竹内丰作为军医中尉,于1943年8月被调到1855部队济南支部,从事细菌制造业务。他在1954年的笔供中,写出了用活人制造细菌战剂的内情:“军医们先把鼠疫菌注射到被俘的八路军战士体内,等鼠疫病发作后,将八路军战士进行活体解剖,一面观察病变,以实验鼠疫菌的效力;一面将八路军战士的静脉血抽出来,利用感染了鼠疫病的八路军战士的静脉血来制造大量鼠疫生菌战剂。”

短短一个月内,他们用11名八路军俘虏实验伤寒菌和鼠疫菌的感染力,培养细菌战剂,其中仅伤寒生菌就制造了16桶半,约有1吨。这批次伤寒生菌,先后三次交给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的军官用汽车运走,散布在陇海线以南地区,特别是京汉线沿线一带。

1855部队在华北各地,像济南支部这样的细菌战分部,至少有13个。可以想见,华北地区广大人民当年所受日军细菌战戕害,何等惨痛!

据北京日报

举行过对空实验,得到了圆满的结果。”

虽然1942年实施细菌实验的具体地点不得而知,但记者在《留守名簿》上找到了这个陆军技师的名字——尾崎繁夫。

除了释放大量有毒跳蚤,有资料表明,1855部队还于1943年在北京实施过霍乱实验。

张斌告诉记者,据《北京崇文区志》记载:“1943年8月,1855部队在北平地区进行散布霍乱菌实验,霍乱迅速在室内外发生、蔓延。崇文区内的玉清观、文昌宫、金鱼池、东花市、崇外大街、西打磨厂等地,都发现了大批霍乱患者。”

另据北京档案馆馆藏的《北京地区防疫委员会防疫课霍乱预防工作报告书(1943年)》中,一份《(民国)三十二年六至十月患者路倒死亡者消毒工作统计表》显示:当年6月和7月,北京只有3例霍乱感染病例,无死亡报告;8月,霍乱病例集中暴发;截至10月底,发现霍乱“患者264例,死亡1780例,路倒92例”。

张斌说,“所谓‘路倒’,应该是路上‘倒毙’之人,但并未被直接统计到死亡人数中。此外,就算加入路倒者,这个死亡数字也非常保守。”

张斌表示,他查到过1943年北京地区防疫委员会的名单,这份名单中的委员、常务委员一共34人。但中国人仅11人,其余23人全是日本人,1855部队部队长西村英二、总务部部长吉见亨都在其中。“因此,这个伪北平政府公布的数据很可能只是局部或者是某一时段的保守数字,未必反映了北平民众的受害全貌。”

张斌表示,新中国成立后对日本战犯审判时发现,侵华日军通过1855部队在山东、山西的支部、派出机构等实施过霍乱等细菌战。

撤走1万个 培养跳蚤的汽油罐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无线电广播20分钟后,队长筱田统便下令破坏细菌研究所。破坏工作持续了三天三晚,通宵达旦。”松井在证言中说道,“在后院里挖了个大坑,把跳蚤全扔进去,然后浇上汽油全烧了。重要书籍和细菌培养器具也都被烧毁了。一万个培养跳蚤的汽油罐被卡车运走。”

“战事结束后第七天,我们便做完了破坏工作,到本部集中。同时,又下令解散部队,把‘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的名称从华北派遣军的名册上涂去,所属官兵都转到各陆军医院去。”松井说。

部队名称可以删掉,但历史不会被湮灭。尽管日本投降后疯狂消灭证据,但战后80年来,无论是记录1855部队成员信息的《留守名簿》,还是记录该部队活动信息的《业务详报》,抑或是部队成员的证言,都在揭示该部队的存在及其实施的罪恶行径。

“日本在战争期间实施的细菌战是不可否认的史实。我们希望通过不断挖掘,敦促政府公开更多信息,也希望通知更多曾经在册的人员或家属,加入我们的研究队伍,早日揭开日本细菌部队全貌。”西山说。

据新华社